

# 语言文化评



白兆麟 著

万物之所以蓬蓬勃勃地生长，  
因为火红的太阳是给它们温暖的教材；  
月光之所以在夜晚那么皎洁，  
由于广阔的星空可提供它最好的文本。

<<<<



份有限公司  
出版社

# 语言文化评



白兆麟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化评鉴 / 白兆麟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36-8792-2

I. ①语… II. ①白…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②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236②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4017 号

语言文化评鉴

YUYAN WENHUA PINGJIAN

---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姚莉

责任编辑:夏业梅

装帧设计:阮娟

责任印制:王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 63683013

排版: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7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手稿原件

## 著者生平与主要论著

白兆麟(1937—),生于安庆,长在徽州。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博士生导师,曾任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先后名列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第16版)和哈佛大学《国际学者名人传》(第10版)。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主要收入《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白兆麟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及《国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主要著作有:

《简明训诂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

《简明文言语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左传微》(点注),黄山书社,1995年;

《盐铁论注译》,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文法训诂论集》,语文出版社,1997年;

《盐铁论句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文法学及其散论》,九州出版社,2004年;

《新著训诂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马氏文通〉综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

《续经籍纂诂》(常务副总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

《国学二十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

《麟角集》,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

《新著汉语文法》,商务印书馆,2017年;

《桓谭新论校注》,黄山书社,2017年。

另有三本散文集:《顾盼集》《唏哦集》《鼎立集》。

## 前 言

《语言文化评鉴》，是我近日联想起往昔发表的好多篇书评而产生的念头，于是找来过去的期刊与出版的几部文集从中搜罗，加上近期所写的几篇读书札记，汇集起来居然有四十多篇，再按照现今的眼光删除几篇而编起如今的目录。见了这份目录，读者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会对写书评、札记有那么大的兴趣呢？

**首先，是出于博士生专题讲授的需要。**早在1997年由我领衔的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获准设立之初，我便为之设计了古代文法学专题、训诂学专题、经典文献讲座等课程，其中必然要涉及不少著名学者的学术专著，予以学理性的评析。在若干年讲座的过程中，便前前后后陆续发表了十余篇。譬如《普通语言学教程》《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以及《说文解字》等，众所周知，都是在各领域具有开拓意义的经典著作，而其下有十余部所评析的对象，也大都是有着创新性的学术专著。

**其次，是由于某种学术责任的驱使。**有些书评与当时的博士生教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是感到有一种学术使命在身，要么为了推动汉语

言文字学学科的深入发展,要么为了纯正学术界的风气而不得已为之。譬如对《盐铁论简注》的纠误,对《中国训诂学》的批评等。

当然,也有几篇是学界友人、昔日学生以及相关出版社编辑的盛情邀约,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譬如对《庄子词汇研究》《艺境无涯》的评析等。

**不过,有不少是由于个人阅读的志趣。**除去语言学科而言,其他文、史、哲方面,国内外也出现了不少顶尖的思想家与杰出的学者,他们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做出过特有的贡献。譬如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西方早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和尼采,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家宗白华与史学家黎澍等。在我看来,他们主要是靠深入思考、广泛阅读和长期积累,从而建构了宏伟的思想体系,酿就了独特的创新思维,形成了某种写作风格的。因此,阅读经典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是一种淡定、执着的“审智”心态,而书评写作则是锤炼思维、提高品位的结晶。这二者所体现的是一种学术信念,而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高雅情趣。

在博士生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的十余年里,由于过去在大学学习时期对外国文学的浓厚情趣,加上长期专业教学研究所养成的思维习惯,我在阅读那些具有严肃主题、严整思考、严正语言的经典文本之后,总会油然触发某种情结,便不由自主地在电脑上敲击起来而形成文字。沉浸在那样的阅读与写作的光阴里,我有时甚至于遐想:

万物之所以蓬蓬勃勃地生长,

因为火红的太阳是给它们温暖的教材;

月光之所以在夜晚那么皎洁，  
由于广阔的星空可提供它最好的文本。

我深深地体悟到：往昔那些天才，是被顶尖级的阅读和创造性的写作所造就的。

由以上所述可知，本书所评鉴的对象，就时地而言，古今中外都有所涉猎；而就内容来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专业性的语言文字学，约 20 余篇；另一类属于非专业性的文化学，约有 10 多篇。前一类包括普通语言学、汉语文法学、训诂学、文献学、文字学方面，后一类涉及哲学、史学、文学与写作学等领域。广则广矣，深则人言言殊耳。不过，这的确留下了我毫不含糊的学术生命的痕迹。

总之，为了弘扬学术而推波助澜，便是这本文集奉献于学界的根本缘由。

白兆麟

2018 年 7 月 10 日



## 目 录

|     |                                            |
|-----|--------------------------------------------|
| 001 | 经典著作,温故知新<br>——再读《普通语言学教程》                 |
| 006 | 《马氏文通》疑难例句辨析<br>——研读《马氏文通》札记               |
| 026 | 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奠基人<br>——评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
| 036 | 论史存直先生的“教学语法”思想<br>——从《关于汉语语法体系》到《句本位语法论集》 |
| 048 | 文法学的走向<br>——重温《古汉语纲要》                      |
| 055 | 建立“汉语通论”的新尝试<br>——许威汉著《汉语学》读后              |
| 061 |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评析                              |
| 066 | 《老子》复句辨析<br>——《〈老子道德经〉句法述要》研读              |
| 075 | 一部独创性与综合性相糅合的巨著<br>——评《上古汉语语法史》            |

- 091 继承传统学术,创新现代思维  
——评《语言学文集》
- 102 一部突破传统训诂界域的巨著  
——《〈尚书〉诠释研究》评介
- 112 《孙子兵法》的集大成研究  
——评许威汉《孙子学读本》
- 124 思路锐密,眼光犀利  
——李葆嘉《钩沉录》评析
- 136 十年磨一剑,其锋芒必现  
——序马启俊《〈庄子〉词汇研究》
- 149 展示佛经文献之瑰宝  
——评《玄应〈众经音义〉研究》
- 160 一部颇有意味的学术专著  
——喜读《汉语避讳研究》
- 169 高屋建瓴,雕梁画柱  
——评《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
- 177 《〈盐铁论〉简注》误释纠正
- 195 重读《从划分标准看文字类型》  
——读陆锡兴论文有感
- 199 统系《说文》的“天道”观  
——《说文解字》再论
- 214 多方探索,接轨现代  
——《中庸义理》析评

- 226 实事求是乃学术之第一要义  
——严正批评《中国训诂学》
- 239 “文本”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解释学·导论》读后
- 243 辩证法思想推动着历史前进  
——《黎澍的“考求历史真实”及其他》
- 247 整体开拓,追根求源  
——《艺境无涯》评析
- 265 宏观构架,微观布局  
——评《写作学概论》
- 275 既要创新思维,也要注入传统  
——《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评析
- 280 信仰能净化心灵  
——读《灵光沐微尘》
- 283 情投缘合,诗书联璧  
——体味《刘永年书法集》
- 289 虚实相间,画龙点睛  
——评《粉墨春秋(二题)》
- 296 诗人余光中笔下的黄山  
——《黄山诧异》值得品味
- 301 惠特曼及其《草叶集》  
——纪念惠特曼逝世 120 周年

|     |                                  |
|-----|----------------------------------|
| 305 | 宗教的世俗与自疗<br>——读长篇小说《荆棘鸟》有感       |
| 308 | 对束缚“人”的个性的极端反叛<br>——读尼采自传《瞧！这个人》 |
| 318 | 柏拉图与孔子<br>——读《柏拉图全集》之联想          |
| 323 | 由“道”而申论“德”<br>——《老子》之再三研读        |
| 332 | 后 记                              |
| 334 | 编后语                              |

## 经典著作，温故知新

### ——再读《普通语言学教程》

孔夫子有一句至理名言：“温故而知新。”这是说，对于一切经典著作，只要认真而反复地温习，往往自能悟出新意，至少越发能够全面地加以理会而不至于片面地引起误解。

一个多世纪以前，被推崇为科学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其后，西方语言学家乃至中国语言学家，都把语言研究的重点放在或转到了口语上。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口语成了语言研究的唯一对象，文字和书面语被视为次一等的、微不足道的研究对象，研究口语才是“科学”的，而研究文字和书面语则是“过时”的。过去，我对此也深信不疑。

退休后，由于已经养成的习惯，加之闲余时间多了，便取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翻来覆去地阅读，因而有了一点新的体会。如今看来，以上所述是一个被误解了的命题。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这个命题是受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提出,声音是概念的符号,而“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一观点在西方延续了两千多年,因为它基本上符合古希腊以来西方语言文字的事实,也大体能解释当今世界上大多数语言文字的事实;然而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尤其不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事实。

第二,这个命题是片面地理解了索绪尔的学说。索绪尔固然曾经沿袭前人所说,文字“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表现语言”;但是,索绪尔毕竟是通晓世界语言文字的大家,他在其《教程》里明确地强调:“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表明:“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汉字是“第二语言”,说得再明确不过了。索绪尔的这个见解,完全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之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说,也突出了汉字的性质与特点。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紧接其后,他还宣告:“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这就等于说,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实际上只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的印欧语言学,并不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内。按理说,这应当引起整个语言学界,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字学者的重视。然而,该书中这么重要的基本论点,过去却被大家忽视了。

笔者在高校从事汉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有半个世纪,也曾就汉

字的性质与特点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一再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具个性、极富特点的表意体系的文字,它可以直接地表达观念和范畴。在汉语里,口说的音节往往比较模糊,听者也往往不能确切地知道说的究竟是哪个词;而一旦写成汉字,只要你认识,不管你原来是说哪种方言,都大体能明白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汉字就是如此的神奇,它虽然也记录汉语的词,但与汉族人口说的词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密。

说到这里,不妨举个饶有趣味的例子。在中国,新婚夫妇在各地都称为“新郎”和“新娘”,不管它们的实际读音如何。这两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从“口说的词”无法考察。然而从字形看,“郎”和“娘”都含有“良”字,自然与“良”有关。古代夫妇双方都可以互称“良人”。例如《孟子》:“施从良人之所之”,此处的“良人”指丈夫。而《诗经·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此“良人”则指妻子。文献证明,“良”既可指“夫”也可指“妻”。为了加以区别,进一步衍化的结果,指丈夫就用“郎”,称妻子则用“娘”。

如果进一步追问,“良”何以用来指称“夫”与“妻”呢?这就不能不涉及该字初始的本义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解释云:“良,首也。”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曰:“良,善也。”据《尔雅》,“良”的本义是“首”,引申为“首领”义。《左传·桓公八年》:“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此“良”指将领。凡为首长,须有众望,于是又引申出“善(美好)”义。中国封建社会里,“夫为妻纲”,丈夫是一家之主,故妻子称丈夫为“良人”,因而“郎”有“主人”之意。其配偶为一家之女主人,故以“娘”呼之。随着语言的流转,“郎”原来具有的“主人”之义逐

渐消失,便转而成为配偶间的称呼。渐渐地,“娘”变为子女对母亲的称呼,而“郎”又变为对未婚男子的称呼。由此可知,少数民族称其酋长为“郎主”,因“郎”与“主”同义。后人不明其义,加之对少数民族的不敬,宋代以后,小说、戏剧里把“郎主”写作“狼主”了。类似这样的实例足以证明,汉字确实具有“表意”的独特个性,说它是“第二语言”十分准确。

然而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后,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符号之符号”这个被误解为绝对的真理出发,又提出一条所谓“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并得到学界的确认:从表形文字经过表意文字发展为表音文字,而表音文字又分为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音素文字是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实,这是由一个错误的前提推导出来的一条似是而非的结论。可是,不少语言文字学家仍然把它奉为圭臬。这个误导出来的结论,在中国所引发的恶性后果,便是“重语轻文”。还是索绪尔说得对:“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事实就是如此,离开文字根本没法探索语言,尤其是原始人类语言的研究,如果不从“书写的证据”入手,那仅仅是凭靠想当然的发音而胡乱推测而已。

上述事实还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以为,对于从国外引进的某些语言文字方面的理论,应当结合汉语和汉字的民族特性与实际情况来认真地加以检验。顺便再提醒一下,索绪尔还曾根据汉语是孤立语之典型,而印欧语是屈折语之标本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汉语是超等



词汇的典型，而印欧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这本来是基本符合两种不同语系语言的实际状况的，可有些学者总是想找出某些零碎而牵强的事实来化解甚至消弭上述基本区别。

须知，汉语和西方语言，无论是拉丁语系还是斯拉夫语系的，都根本不同，而汉字在世界现存的众多文字当中，更是独树一帜。在运用国外引进的语言文字理论来解释汉语和汉字现象的时候，切不可生搬硬套，而应当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才是。归根结蒂，我们的语言文字学家应当从本土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总结自身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学理论来。

正是应了诗人苏轼所咏唱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

2000 年春